

学术中国丛书

XUESHU ZHONGGUO CONGSHU

文化 嬗变的 时代色彩

我们探讨当代中国文化的嬗变，当然离不开伟大的改革开放运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变迁自然是文化嬗变的神奇动力。

季国清◎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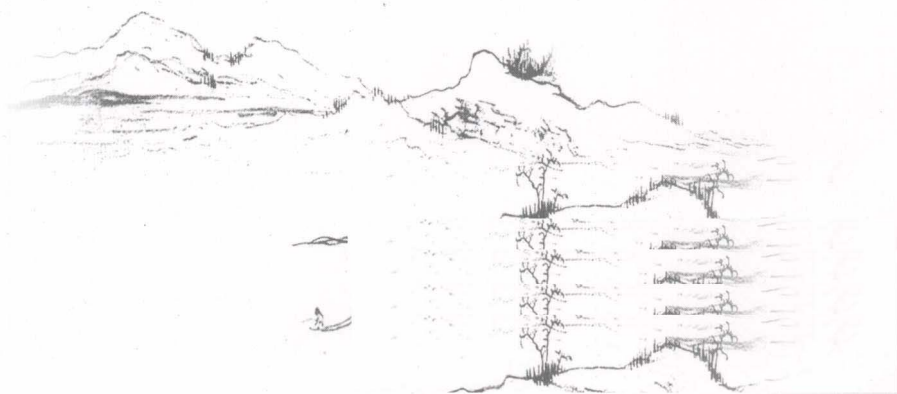
学术中国丛书

XUESHU ZHONGGUO CONGSHU

文化

嬗变的 时代色彩

汪传生
高云球◎主编
季国清◎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奎 朱 蒙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嬗变的时代色彩/季国清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

ISBN 978-7-01-007072-8

I. 文… II. 季…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4620 号

文化嬗变的时代色彩

WENHUA SHANBIAN DE SHIDAI SECAI

季国清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7072-8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丛书序言

人文科学通向 20 世纪的台阶和走出 20 世纪的通道是同一种哲学理论：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给 20 世纪的新年钟声编织了意识世界自导的旋律和节奏，后现代哲学家为 20 世纪的除夕晚餐加入了人类自酿的美酒和佳饌。两者一而贯之地论证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类是使用自己意识世界的特殊编码来认识我们周边的事物，它们是我们和现实世界的接口。但是，它们却常常与历史合谋，模糊和误导我们的理性和知性。这就是梅洛·庞梯的《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所揭示的真理：直觉和知觉并不是独立地使用现实的模型和标准来理解、感知世界的现实状态，而是翻开意识的旧账在现实寻找和其匹配的内容。科学程序中有一个最让人迷惑的环节，就是科学观察。在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之前有谁能想到，观察其实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可事实就是如此，人类是一种历史性的动物，就像地球上的动物是基因的历史性决定一样，我们是被意识的历史性决定。

自然科学使用同一种理念，既打开了 20 世纪的神秘门户，又关闭了 20 世纪的科学礼堂，这种理念就是相对性原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充分证明了宇宙中的一切参照系统都是相对的，任何置身于其中的事物都和参照系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相对的真正含义就是世界上没有

绝对独立的背景和舞台，它们都和演员和导演处于互动之中。所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发现。在20世纪的尾声，人类的三大科学与其繁衍的三大技术——生物科学和基因技术、信息科学和网络技术、材料科学和纳米技术把世界装点得如诗如画。自然科学在20世界的成果综合起来就是说，作为我们人类的他者——自然界和宇宙整体都是现实性和直接性的。或者换句话说，世界是四维的，时间和空间永远紧密地连在一起。

这种对比告诉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在不停地创造现实，人类常常落后于现实，人类和世界现实性的距离就是考验人类的重要标准。尽可能缩短和世界现实性的距离，就是我们的唯一追求。人类是必须区分成性别、地域、民族、群体、政党、团体、宗教等类型的，那么，每一种群体的竞争和相对的标准自然也是和世界现实性的距离。

20世纪人类关于语言的研究有许多重大突破。语言并不是一个透明的可以让思想自由通过的实体，语言既塑造思想又扭曲思想，语言同时还塑造人和人类。人创造自己的创造者，而人的创造者又创造出人类，即整体性的和未来性的人本身。于是有许多哲学家对于语言有着这样精辟的论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的家园。奥斯丁说，语言超越于言说语言的人本身；罗素说，语言和世界同构；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一个独立的游戏体系。于是，人类和世界的距离就表现在我们的语言里，每一种语言都有与其对应的人类群体。那么，这种语言的符号世界和世界的现实性的距离就是这个人类群体的现实水准。在那些原始人的群落中，他们的语言没有一句和世界的现实性相关的话语。于是我们说，他们落后于时代。如果一个群体的语言 and 这个群体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我们就说，这个群体背离了自己的语言，或者他们的语言背离了这个群体，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不仅是语言的悖谬，也是一种困境。

用语言创新，是人类中一个特殊的群体的特殊功能——这个特殊群体就是知识分子。他们非常独特，必须是以个体的形式并且相对独立工作的人群，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独特的构造语言的能力，来生产那些还没有在

世界上出现的语句，甚至是还没有出现的语词，还能构造那些只在语言中存在而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的语词和使用这些语词的语句。语言的使用就是形成话语，话语是语言在现实中的具体形式，并以系统的方式构成一个整体——就是它们在缩小语言和世界的直接距离。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生活着许多古老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古老就意味着和现实的距离可能加大。但是，现实同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要没有踏上更大的范围，只在自己生活的领域内，现实只是和它的生活境遇有关。这有一个实在的判定标准：就是看它的语言和它的生活境遇是否接近，是否大体同构。事实上彻底同构是不可能的。现实是一个四维空间的世界。没有现实，它就只能是三维空间，而不是四维空间。我们出版《学术中国丛书》就是要给人类找回那个失去的维度，即时间性这个标志着现实性的维度，从而抵达真理和知识的彼岸，为学术之树的繁盛而敬献绵薄。

《学术中国丛书》是由洛杉矶东方文化形态研究院主持的大型系列丛书。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以及编辑何奎先生对这一套丛书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方便，对于他们慧眼识真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我们真诚地希望把这套丛书做得尽善尽美。这既是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期待，更是我们的预见。

是为序。

汪传生 高云球

2007年3月6日

于美国洛杉矶东方文化形态研究院



文化嬗变的时代色彩

目 录

CONTENTS

一	定 性	1
1	整体主义解读	8
2	个体主义剖析	18
二	转 型	31
1	市场化	38
2	互联网	49
3	新信息	57
4	大地理	72
5	世界经济一体	82

三 表 征 93

- 1 自然人对社会人的背离 97
- 2 经济人对政治人的背离 114
- 3 功利主义的可分解性 133
- 4 社会的平面化运动 138
- 5 历时性向共时性的倾斜 150
- 6 己所欲之，不施于人 156

四 新 生 163

- 1 价值取向 173
- 2 协同学与序参量 181
- 3 不可逆 190
- 4 公平与正义的起点 196



一 定 性



“定性”就是给文化整体主义一个合适的定义和界说。当我在勾画本书的结构时，设计了一个让读者感受整体主义的方式，这就是现在这四部分的命名：定性，转型，表征，新生。四个题目本来并没有必要非严整不可，但我在这里故意用文字数量一致又合辙押韵的形式，正是要以此做一个示范——这就是整体主义。整体主义就是要用同一性和同一律来实施对整体的控制和统治。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中国的这句古话在时间和在空间上都有长久的生命力。写那些严肃严谨严密的书只能是给行家看的，而同行的小圈子往往是一个个非常小的集团，在这样的圈子中流通只是文化资本的增值方式，而非社会资本的增值方式。我写这本小书只是想表达我对今天的中国在文化方面变化的看法，带有明显的纯感觉和纯知觉的意味，绝对不属于严肃严谨严密的学术论证。因此，我不是要在学理上说明文化的性质和文化的分类，只是要大致描述一下中国文化以及与其相对的其他文化的典型特征，这也就足够这本小书的承载量了。

文化的确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当它独立和孤立存在的时候，人们根本

不知道它的存在和作用,只是被动地接受和承受而已。每一个人都会把文化的规范和规定、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看成是世界天经地义的成分,看成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框架,看成是种族安全和繁衍的保证。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天然的信念之中,发生在潜意识里,发生在人与人的交往模式内部。这样,文化的发生学就和人的发生学直接同构。因此,没有两种以上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就不会有文化的自觉研究和文化意识的产生。中国文化是在相对独立甚至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存在和延续的,认识中国文化应是在西方人来到中国之后的事。马可·波罗^①的时代,甚至是利玛窦^②和后来的耶稣会教士的时代,只是少数西方人来到中国游历,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下,他们对中国的若干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政治结构、生活样态、思想模式等,感触颇深而已;古代中国人基本不会产生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和探索。真正让大家对文化这种现象有意识地产生一点认识,绝对是人类学产生之后的事。

人类学产生在西方。正是人类学首先让西方人认识到还有文化这样的使人陶醉、使人完善、使人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存在。人类学也让中国人了解了自己其实也是处在文化之中,自己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处在遥遥相对的位置上。初期的人类学只是对那些处于原始状况下的民族进行的研究。在这些最早的人类学著作中,偶尔也有对中国文化的简单评述,如吕西安·列维·布留尔^③的《原始思维》;但是,单独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至今为止也没有产生。传教士们在20世纪初曾经写过若干本有关中国文化

① 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商人。他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历时四年多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17年,回国后写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记》《东方闻见录》)。

②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

③ 吕西安·列维·布留尔(1857—1939),俄裔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他的《原始思维》是最有影响的人类学著作之一。他对原始心理状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形式、以互渗为规律的前逻辑式神秘思维。这种思维相信人与外界事物之间有着部分或整体的等同,二者可通过神秘的方式来彼此参与、相互渗透,形成极为独特的认识过程。他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那里借用集体表象这个概念,来说明原始人和现代西方人在推理方面的差别。

杂感的书，如卫礼贤^①的《中国心灵》、罗斯^②的《变化中的中国人》等。这些书籍对认识中国文化很有好处，但它们根本就不是学术著作。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在20世纪也风起云涌，不过系统性的文化研究大多是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的历史线索的，其中的著名学者有钱穆、牟宗三、余英时^③等。我在本书中所说的定性只是我个人综合若干研究后的一点认识。这样，就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比层面上将其揭示出来。

比较研究是在西方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却带来了学术上的巨大突破。表面上看，比较只是一个具体的研究方法，但是，只要我们深入探索比较的过程、可以实施的预设条件时，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其实比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比较既是构成性的，又是隐喻性的，既是本体论的，又是认识论的。这是因为比较必须有一个比较的平台，建构这个平台只能是依据比较者的个人背景和个人水准来进行，而这些纯个人化的东西恰恰是文化给他提供的用武之地。比较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先进文化的标尺大规模展示的计量所，成了比较者的文化理念在潜意识中抉择和取舍的思想操作。所以说比较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先进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用于落后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一种尝试。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除落后的文明也拿自己的标准来比较。但是，这种情况既没有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今后更没有这种可能，因为落后的文化和文明常常故步自封，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上唯一正确和唯一可能存在的文化现象，不会产生比较的需要。

比较不能面面俱到：一方面，面面俱到是绝对不可能的尝试，另一方面，面面俱到又只能是囫圇吞枣的现象罗列。因此，一定要找到具体问题

① 卫礼贤（1873—1930），德国汉学家。原名为理查德·威廉，来中国后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1899年，卫礼贤来到中国青岛，开始了他的传教生涯。卫礼贤翻译过《论语》《大学》《诗经》等儒家经籍和《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著作，还著有《实用中国常识》《老子与道教》《中国的精神》《中国文化史》《东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变迁》《中国哲学》等。

② 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1866—？），美国社会学家。20世纪初曾旅居中国。他的《变化中的中国人》出版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前西方观察中国的代表著作。

③ 此三人皆为新儒学学者。他们研究的思路基本上是在整体上肯定儒学的本体论地位。

比较的要点和重点。西方人在文化和文明类型的人类学研究中，正是循着这条确定要点和重点的路径一步步走到了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人类学主要是就原始人群的思维特征来比较的，如弗雷泽^①、吕希安·列维·布留尔、泰勒^②等。到了摩尔根^③的时代，财产的分配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又成了重点。20世纪的马林诺夫斯基^④则以性爱和婚孕家庭的组织方式为重点。列维-斯特劳斯^⑤的结构人类学在人类的思想结构和社会结构诸方面揭示着文化和文明的差别。这些研究都是可以区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人文的技术。但是，正如自然科学的技术在不断前进一样，人文的技术也日新月异。到了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判断和区分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工具可以说越来越完善。这就是关于权力话语和普遍语义学的新知识。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⑥倾其一生的才华和精力研究知识背后的权力，找到了权力这样的关系化结构和操作在知识背后的决定性作用，确立了一种新型的哲学研究思路和哲学研究方法，即谱系学方法。他的著作生动活泼，立论新颖，雅俗共赏。比如他严格证明了疯癫只是关于疯癫的语词内涵在社会上制造的精神病。因此，当关于疯癫的语词变化时，疯癫

①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是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的先驱。弗雷泽一生的研究成果尽在《金枝》一书。

② 爱德华·泰勒 (Edward Taylor, 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被人类学界尊称为“人类学之父”，“在人类学中第一个伟大的名字”，是最有影响的进化派和人类学派的经典作家。代表作有《原始文化》《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等。

③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主要著作有《古代社会》，恩格斯在此书基础上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易洛魁联盟》《人类家庭的亲属制度》。

④ 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 1884—1942)，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澳大利亚土著家庭》《南海舡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比较》《文化论》《巫术、科学与宗教》等。

⑤ 列维-斯特劳斯 (C. Claude Levi-Strauss)，1908年生，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结构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著作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热带忧郁》《结构人类学》《野蛮人的心智》《神话学》等。

⑥ 米歇尔·福柯 (Micha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发现了权力运作知识和精神的奥秘。代表作有《癫狂与文明》《词与物》《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性欲史》等。

的病症和表现同样变化；医生之所以成为疾病的诊断者和生物死亡的裁决者就是因为他们有当医生的话语权力；性行为只是关于性的理念和关于性的权力话语约束下人类生物性的一部分；知识的类型变化同样是关于知识的权力结构转换的结果。这样，福柯就给人类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即权力这样的东西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上规范着人类的行为和思想。把福柯的哲学推而广之，即把权力背景和权力话语的学说用于说明整个人类的社会组合和人类群体的结合方式，就会清清楚楚地看到，其实自从人类进入文化的历史阶段之后，人们的追求不是别的，正是权力话语的占有和使用。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人类的群体之间和人类的个体之间暴力的使用都相当频繁，相当激烈。但是，暴力并不是目的，不是动力，不是终极状态；暴力仅仅是为了权力话语可以生效的那种工具和手段。试想，如果一个人已经是一呼百诺，一言九鼎，他还需要使用暴力吗？

在不同的社会中，获得话语权力的方式和话语权力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由它们之间的本质所决定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们的权力话语的特征上。

语用学是 20 世纪又一大人文技术的发明。英国人奥斯丁^①在 20 世纪中叶对语言的功能作了深入的思索，提出了以言行事的理论，为语用学奠定了基础。语言不仅有表达的功能更有以言行事的功能，即我们使用语言可以像使用一件物质工具那样去做事，尤其是对听话者来说这种功能尤为突出。仔细想一下，权力话语不就是典型的以言行事吗？后来的语用学发展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语言学的重要分枝，它现在研究的是关于语言内部对于语言使用者的限定和规范，或者说语用学就是研究在语言内存在的限定语言使用者的那些条件。语言是一套规则系统。在语言中存在着一一些规

^① 奥斯丁 (J. L. Austin, 1911—1960)，英国语言哲学家，语用学的奠基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严格证明了语言是一种实在，这是多元实在论的实证基础。他系统地、精细地研究日常语言理论，为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观点提供了语言学的基础。它不仅有哲学意义，也有语言学意义。其代表作有《如何以言行事》等。

则,言语行为者必须严格遵守,如果违背了这些规则,语言就会对使用者屏蔽,使用者最低是处于尴尬的局面,甚至是使交际彻底失败。如语用学所揭示的“礼貌原则”、“指称原则”等,都告诉我们,语言的确可以以言行事,但要遵守语言中早已存在的属于语言自身的限制。语用学就是以言行事的外在条件。

20 世纪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十分特殊的领域,即数学中关于数学完全性的证明。它是由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哥德尔^①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提出的。哥德尔研究了自然数集合中的完全性问题,他严格证明了数论体系中的自然数集绝对不能解决自我相关的悖论,也就是在自然数集合中存在着这样的命题。这些命题和它们的逆命题都不能在自然数集合中找到答案。如命题 k: 命题 k 在自然数集合中是不可证明的,如果我们证明了这类命题是可证明的,它同时就是不可证明的。这类命题就叫做自我相关的命题,也就是说在自然数集合中不能解决自我相关的问题。后来对于这一问题深入研究的结果是使人们得出了更有见地的新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分支类型论,它主要是由英国全能的学者罗素^②完成的。罗素提出了解决自我相关的悖论的方法,即规定命题的层次:较高的层次规定其他层次的规则和范围,而这些规则却不能用来对这一最高层次进行限定。这样就解决了自我相关的问题。这套办法就是把命题进行人为的分类,或者说把命题都擦起来,就像在现实生活中把具体的物质器具一个个擦起来一样,同时规定底下的那些东西不能干预上边的那些东西,但反过来却可以。

经过这样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权力话语作为以言行事的功能,它们将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其中一种是可以有自我相关的能力的,即这类权力话语对于其提出者和实施者都具有约束力,对于任何人都

① 库尔特·哥德尔 (Kurt Gödel, 1906—1978), 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和连续系统假设的相对协调性证明。他的理论证明了一个自我构造的形式化系统不能解决自我相关的悖论,这一理论被引申为没有自我相关能力的组织必然走向灭亡。

②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罗素一生著述繁多,门类齐全。1950 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适用；而另一类权力话语却不具有自我相关的能力，也就是说权力话语的实施者不在这些权力话语的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后来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①就用语用学理论来构造他的理论框架。他的理论叫做普遍语用学，这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和主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类交往模式的变化和发展。所谓交往模式就是指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相互往来的规则的集合和系统，人们能够往来就是因为有这些规则的集合和系统作为保证。这种规则的集合和系统的性质就是它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性质——人类的交往行动模式必须是在交往者之上而又被交往者所遵守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这就类似于语用学规则必须被言语使用者遵守一样。所以，哈贝马斯称其为普遍语用学。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话语权力的性质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具有自我相关能力和条件的权力话语，一类是不具有这种能力和条件的权力话语。当权力话语具有自我相关的能力时，在这种权力话语之下的每一个人就都是这种权力话语直接作用的对象。这样的权力话语就是一种凸显性的权力话语，或者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不在场性的权力话语，所谓的不在场就是不被任何一个具体的自然人来控制 and 调整。显而易见，这种权力话语指导之下的人类社会和人类其他组织形式就是个体主义的。反之，当某种权力话语不具有自我相关的能力，即有一部分人或者某个人不在这种权力话语的范围之内，这些权力话语对他们或者这个人没有规范作用，那么，这个人或这些人就是以在场性来实施对自己有利却又对他人规范和约束的权力话语。当然，这后者就是整体主义的文化和文明的典型性特征，因为这种权力话语的实施只能是把世界上的事物像叠罗汉那样累加在一起才有可能。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判定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简单性标准：整合社会

^① 哈贝马斯，1929年生，当代德国与西方重要的理论社会学家、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理论与实践》（1963）、《知识与兴趣》（1968）、《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交往行为理论》（1981）、《交往行为理论（补充与论证）》（1984）、《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以及《在事实与规范之间》（1994）等。

的权力话语是自我相关的，就是个体主义的文化或者个体主义的社会；整合社会的权力话语是非自我相关的，就是整体主义的文化或者整体主义的社会。我们的分析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所谓整体主义的终结也正是这种权力话语的自我相关性越来越被全社会的成员所崇尚。

／ 整体主义解读

权力话语在一个社会之内往往包括三个类型：其一是文化上的权力话语，一般来说这种权力话语是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常常以伦理和道德的方式来体现，也可能包括一些习俗和礼仪；其二是政治上的权力话语，主要包括政令、政策、法律、法规；其三是经济上的权力话语，主要指经济集团中那些指挥经济活动的权力话语。由于经济上的权力话语是和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资料占有权直接相关的事，它对于社会的整合虽然有关联，但是它毕竟和经济的必要条件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更密切，我们对它的考核只能是在权力的同构性上来考虑；政治权力话语和文化权力话语则是标志整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伦理和道德在西方是一种从属关系，即伦理是关于道德的系统学说，是在哲学层面阐述道德形成的根据、道德原理的合理性、道德的中心法则和道德的实施条件的；道德则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在法律之外协调社会关系的最重要的行为标准。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也许康德的学说解释得最清楚。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两部著作中把这种伦理和道德的内在相关性解释的惟妙惟肖，头头是道。这就决定了在西方社会中，最低是在康德所在西方社会中，伦理和道德相得益彰，构建着社会的和谐和平等。

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和西方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全然不同。在汉语中，“伦”指辈分，即一代一代之间的关系和代际之间的排列。那么，伦理就是规定代际关系准则的那种学说，西方没有与其相对应的学科。这正是中

国古代文化的初始条件所决定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①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定义了历史的轴心期，即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这段时间中，在东西方相继产生了几种文明的核心思想和其代表人物，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东的所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中国的孔子和孟子、犹太人的以赛亚等，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轴心期。也可以说这就是这几种文明产生的初始条件。

对于中国文明类型的阐述有许多大学问家各抒己见。也许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中国古人自己对中国文明类型的认识并不是那么全面和客观。西方人对中国进行文化学上的研究起始于19世纪。在此之前的西方人对于介绍中国有过杰出的贡献，但是，他们的思索还不是文化研究。到了19世纪末，西方的一些传教士在中国下层的贫民百姓中生活，他们的观察虽然还不算系统和真切，但是具有文化上的意义，如上文所说的卫礼贤的《中国心灵》、罗斯的《变化的中国人》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不过真正对于中国文化的初始条件和中国文化的后来走向的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应属美国学者芬格莱特^②，他的《孔子：既凡而圣》一书对中国文化在其初始条件下形成的文化模式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孔子的学说即中国文化的初始阶段形成的文化模式是以礼教和礼节的强调和推崇为核心的理论和理念。中国学者陈来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③一书中把礼解释为秩序，即对长幼、尊卑、上下、强弱、好坏等秩序的肯定和维护就是礼，这就把中国文化模式彻底说明白了。伦理就从这种理论和理念的襁褓中产生。

中国古代社会的伦理秩序在建立的过程中要找到一个模本和典范，这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圭臬的父子关系。说“父为子纲”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精髓和经典，必须首先说清楚“父为子纲”在

①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把公元前3世纪到6世纪定义为历史的轴心期，即历史产生的精神摇篮。

② 芬格莱特，1921年生，美国著名的哲学家。

③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